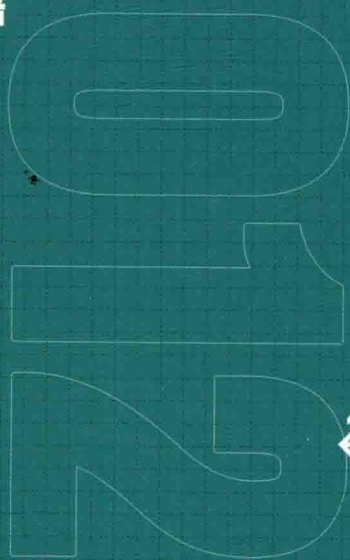


“十二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



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学术出版资助项目

总主编：金 碚



经济管理学科前沿研究报告系列丛书

THE FRONTIER RESEARCH REPORT ON
DISCIPLINE OF
AGRICULTURAL ECONOMICS

周应恒 等 主 编

农业经济学学科 前沿研究报告



经济管理出版社

ECONOMY & MANAGEMENT PUBLISHING HOUSE

“十二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

 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学术出版资助项目

总主编：金 碚

 经济管理学科前沿研究报告系列丛书

THE FRONTIER RESEARCH REPORT ON
DISCIPLINE OF
AGRICULTURAL ECONOMICS

周应恒 等 主 编

农业经济学学科 前沿研究报告



经济管理出版社
ECONOMY & MANAGEMEN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农业经济学学科前沿研究报告 2012/周应恒等主编. —北京: 经济管理出版社, 2017. 1
ISBN 978-7-5096-4718-9

I. ①农… II. ①周… III. ①农业经济学—研究报告—世界—2012 IV. ①F3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259191 号

组稿编辑: 张永美

责任编辑: 胡茜

责任印制: 黄章平

责任校对: 张青

出版发行: 经济管理出版社

(北京市海淀区北蜂窝 8 号中雅大厦 A 座 11 层 100038)

网 址: www.E-mp.com.cn

电 话: (010) 51915602

印 刷: 玉田县昊达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787mm × 1092mm/16

印 张: 27

字 数: 591 千字

版 次: 2017 年 1 月第 1 版 2017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096-4718-9

定 价: 89.00 元

·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

凡购本社图书, 如有印装错误, 由本社读者服务部负责调换。

联系地址: 北京阜外月坛北小街 2 号

电话: (010) 68022974 邮编: 100836

目 录

第一章 农业经济学学科 2012 年国内外研究综述	1
第一节 国内文献综述	1
第二节 国外文献综述	13
第二章 农业经济学学科 2012 年期刊论文精选	19
第一节 中文期刊论文精选	19
“新农合”：经济绩效还是健康绩效？	20
江苏省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调查和思考	39
经济增长、收入差距与农村贫困	48
产业组织模式对农产品质量安全的影响：来自奶业的例证	67
生计资本、生计风险与农户的生计策略	93
社会资本是穷人的资本吗？ ——基于中国农户收入的经验证据	101
新时期国家粮食安全战略和政策的思考	123
消费者对含有不同质量安全信息可追溯猪肉的消费偏好分析	131
基于收入分层 QUAIDS 模型的广东省城镇居民家庭食品消费行为分析	146
复杂产权论和有效产权论 ——中国地权变迁的一个分析框架	159
交易费用、农户认知与农地流转 ——来自广东省的农户问卷调查	178
气候变化是否影响了我国过去两千年间的农业社会稳定？ ——一个基于气候变化重建数据及经济发展历史数据的实证研究	193
“老龄健康”的经济学研究	225
健康人力资本、经济增长和贫困陷阱	248
城镇化对粮食需求的影响 ——基于热量消费视角的分析	266
中国与金砖国家农产品贸易：比较优势与合作潜力	275
中国农业对外开放：影响、启示与战略选择	289
农户正规借贷需求及其正规贷款可获性的影响因素分析	302
宗族网络、农村金融与平滑消费：来自中国 11 省 77 村的经验	313



城乡金融发展非均等化的形成机理及对策

——基于自组织理论的分析..... 330

第二节 英文期刊论文精选..... 335

第三章 农业经济学学科 2012 年出版图书精选 359

第一节 中文图书精选..... 359

第二节 英文图书精选..... 380

第四章 农业经济学学科 2012 年大事记 397

第一节 国内大事记..... 397

第二节 国外大事记..... 402

第五章 农业经济学学科 2012 年文献索引 405

第一节 中文文献索引..... 405

第二节 英文文献索引..... 415

后 记 427

第一章 农业经济学学科 2012 年 国内外研究综述

第一节 国内文献综述

本报告以农业经济学理论结构为划分基础，对 2012 年国内与农业经济学理论相关的文献资料进行梳理和内容划分。考虑到篇幅与质量问题，笔者从这些资料中精选来自《中国社会科学》、《经济研究》、《经济学（季刊）》、《管理世界》、《中国农村经济》、《中国农村观察》、《农业经济问题》、《农业技术经济》等学术期刊的 100 多篇论文，并进行综述评价。本次文献资料整理的国内期刊主要来源于 CSSCI。文献综述包括农业经济理论与政策、农业资源与环境、食物经济与管理、营养与健康经济、农产品市场与贸易、农村与区域发展、农村金融与保险七方面。

一、农业经济理论与政策

在我国农业发展进程中始终伴随着农业政策的不断调整，农业政策的适应性调整为我国农业发展面临的内外环境变化提供了支持，保障了我国农业的长期和稳定发展。目前，学术界对农业政策的研究主要包括“新农合”、“新农保”、农业补贴政策、生产组织形式等方面。

在“新农合”政策方面，程令国和张晔（2012）利用 2005 年和 2008 年中国老年健康影响因素跟踪调查的两期数据，从经济绩效和健康绩效两个角度对“新农合”的绩效进行了考察，研究发现，“新农合”显著提高了参合者的健康水平，但是未明显降低医疗负担。李立清（2012）基于五省的调查数据，实证分析了影响农户参与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稳定的因素，研究发现，户主年龄、户主受教育年限、户主自评健康等级、家庭成员中是否有慢性病患者、家庭成员有因病获得住院补偿情况、家庭人均纯收入水平、家庭人口规模、家中有 60 岁以上的老人、所在村庄生育观念、农户家庭距乡（镇）医院距离等户主个体特征、家庭特征和“新农合”制度实施环境因素，都不同程度地对农户退出“新农合”风险产生了显著影响。刘晓梅和刘波（2012）从收入和医疗支出两个方面分析了



城市和农村以及农村内部的差异状况，得出我国医疗保险制度中的差异性趋势是医疗支出的差异性在逐渐缩小，而医疗服务的差异已经到了农民可承受的边缘，需要政府及时改革。

在“新农保”政策方面，黄宏伟和展进涛（2012）利用农业部农村固定观察点2011年全国抽样调查数据，实证分析了农户参加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概率和缴费金额的决定因素。研究发现，家庭经济条件越好，农户参加“新农保”概率越低，缴费金额越高；家庭养老负担和教育支出压力制约了农户“新农保”参加概率和缴费金额；家庭经营耕地面积越大与户主文化程度越高的农户，其参加“新农保”的概率更高。孙文基和孙骏可（2012）在介绍江苏省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基础上，总结了取得的突出成绩，分析了存在的主要问题，从完善制度、正确处理财政压力与进一步加大财政投入的关系、加强经办能力建设、加强基金结余管理、加快立法工作几方面提出了完善的具体对策。

在农业补贴政策方面，张淑杰和孙天华（2012）运用DEA和Tobit模型，分析了现行农业补贴政策效率及其影响因素。分析表明，农业补贴政策存在较高比例的DEA无效，农业补贴次数、亩均农业补贴水平、农业补贴类型与补贴次数、农资价格上涨等因素对农业补贴政策效率具有显著的影响。王士海和李先德（2012）考查了中国最低收购价政策是否起到对粮食市场的托市效应，研究发现，最低收购价政策对大部分粮食品种存在托市效应，其中小麦的政策效果最为明显，油脂业用大豆的政策效应为负，同样的政策对主产区 and 主销区的影响也有所不同。洪自同和郑金贵（2012）通过对福建省农户调研的数据，探讨农机购置补贴政策对农户粮食生产行为的影响。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农户是否扩大水稻种植面积的主要影响因素是农户家庭农业劳动力人数和农户从集体承包的耕地面积，而农户从集体承包的耕地面积和对农机购置补贴政策的评价对农户扩大多少水稻种植面积具有显著影响。

在组织形式方面，扶玉枝和黄祖辉（2012）测算了2009年浙江省营销合作社总体及细分产品类型的技术效率、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结果表明，无论是总体还是分产品类型，浙江省营销合作社技术效率水平均较低，且技术低效率的主导因素是纯技术低效率。孙亚范和余海鹏（2012）分析了中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成员的合作意愿及其影响因素，研究表明，农民专业合作社成员在参与合作中普遍缺乏投资入股、稳定惠顾和扩大产品生产规模的意愿，中国农民专业合作社尚未形成稳定发展和持续成长的内在机制；成员的合作认知水平、获得的合作收益及其满足程度、对管理层的信任程度、合作社盈余返还分配制度和社员股金制度是否健全以及成员在合作社中的某些角色差别，是影响成员合作意愿的主要因素。黄祖辉和高钰玲（2012）实证分析了影响农民专业合作社服务功能实现程度的主要因素。研究发现，农民专业合作社主营产品其产品特性对其服务功能的实现程度具有显著影响，但目前不同主营产品类型农民专业合作社的服务功能并未完全实现。成员拥有的资源状况、社长的企业家才能以及对社长的激励程度都会影响合作社服务功能的实现程度，产业集群、产品认证以及政府的资金扶持对合作社服务功能的实现程度也有显著影响。蔡荣和韩洪云（2012）实证分析了影响农户参与合作社程度的因素，研究发现，

苹果种植面积、苹果收入比重、苹果质量、市场价格水平和果品市场距离等对农户是否参与合作社具有显著的积极影响，户主文化程度、市场价格波动等对农户是否参与合作社则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

其他政策涵盖禁牧政策、退耕还林政策、征地补偿政策等。海力且木·斯依提等(2012)以新疆富蕴县等六个典型牧业、半牧业县的调查资料为基础，分析禁牧政策实施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韩洪云和喻永红(2012)采用陈述偏好法中的选择实验法，基于重庆万州的调查数据，评估了退耕还林的环境改善价值、退耕还林政策的可持续性和受益者对保护退耕还林成果的支付意愿。结果发现，退耕还林给项目区带来了巨大的环境价值；退耕还林政策具有很好的绩效和可持续性；样本区绝大多数家庭对退耕还林具有较强的支付意愿。林乐芬和金媛(2012)实证分析被征地农户受偿满意程度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地方政府征地补偿政策执行滞后偏离程度越大，被征地农户受偿满意程度越低，中央政府征地补偿政策效应就越低；被征地农户家庭特征、被征地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和被征地块的特征因素，都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被征地农户的受偿满意程度。

二、农业资源与环境

自改革开放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在长期保持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不断强化环境保护，追求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相协调，体现出生态现代化取向；但技术条件不足、经济发展不充分和不均衡、以制造业为支柱产业、带有鲜明的政府主导色彩，又使得中国生态现代化具有自身特点及风险(洪大用，2012)。农村环境治理和保护作为环境保护的一个重要方面早已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低碳农业、生态农业、循环经济等领域的发展为农村环境的改善和资源的有效利用起到了很大的助推作用。

陈卫洪(2012)利用我国1990~2009年的土地利用变化数据，运用相关计量模型对农用地面积、建设用地面积和林业用地面积与农林牧渔等部门二氧化碳排放通量的关系进行分析。建议在合理、高效利用现有土地的同时，通过加强农地保护和林地抚育，继续增加植树造林等措施来促进我国低碳农业的建设和发展。低碳农产品中的低碳特性是指通过控制农业生产资料生产过程的石化能源消耗、农业生产过程中不合理使用化肥农药等生产资料、农产品加工流通包装物的能耗和农业废弃物的不合理处理等碳排放源，实现最少的温室气体排放所带来的减缓气候变暖的环保价值。湿地保护与生态农业发展一直是理论和实践中众人关注的问题。杨新荣(2012)以洞庭湖区为例，按照种植型、养殖型和综合型研究了基于湿地保护的生态农业模式，并针对不同区域特点给出发展建议。农业生产废弃物循环利用是实现生态农业的重要途径，而基质化是农业生产废弃物循环利用产业联动的重要路径。李鹏(2012)针对农户农业生产废弃物基质化循环利用行为进行实地调研，采用DEA-Tobit两步法，测度农业生产废弃物循环利用的产业联动绩效，并分析内外部环境因素对农业生产废弃物循环利用产业联动绩效的作用方向及程度。

在有关农村环境的农户行为方面，大量学者进行了相关研究。刘莹（2012）在全国范围内对 660 个农户进行实地调查，并对影响农村生活垃圾处理方式的要素进行了分析。黄武（2012）认为农户秸秆处理行为主要受到投入要素价格和农户所拥有的资源状况的影响，降低农户实际支付的要素价格以及改善农户的资源状况将有助于促进农户对秸秆资源的综合利用。褚彩虹（2012）通过了解太湖流域农户的有机肥选用与测土配方施肥技术，研究了农户采用环境友好型农业技术行为的影响因素。苗艳青（2012）研究了农村居民对环境卫生改善的支付意愿与其影响因素，发现相对于当前的改厕成本，我国农村居民的改厕支付意愿较低，虽然东部省份的平均支付意愿高于中西部省份，但是西部省份比东部和中部省份有更高的改厕需求，而农村居民改厕支付意愿的概率不仅是收入水平的体现，更重要的是知识、态度、个人卫生行为的体现，这些非经济变量对农村居民改厕支付意愿概率和数量都有非常显著的正向影响。

在资源经济方面，土地和水作为农业生产的基础性资源一直受到很多学者的关注。张曙光（2012）从新的角度研究了中国地权的变迁，他认为中国农地产权的变迁过程说明了土地流转的出现在经济发展与技术进步中是一种必然，而除了产权问题之外，中国的土地流转还有其他的障碍，其中最突出的就是土地市场的发育不全、交易费用高昂。罗必良（2012）等将农户的土地承包经营权退出分为经营权退出与承包权退出，分析了农户对于土地承包经营权的退出意愿及其影响因素，并提出应重视农民的意愿冲突和政策目标的冲突。此外，对于指标控制下的城乡土地流转机制，谢新（2012）以成渝地区地票实践为例，研究了城乡土地流转的微观机制，指出了地票制度中存在的不足与症结所在，对国土资源部将实施的经营性建设用地初次流转市场化的制度设计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宋敏（2012）以武汉市洪山区为例，运用条件价值评估法和层次分析法，对耕地的总外部效益和局部外部效益进行了定量估算。研究发现，耕地除了具有一般的生产功能之外，其产生的社会、生态方面的外部效益更是不容小觑，而长时间对耕地资源外部效益的忽视以及缺乏将其内在化的机制和途径，使得农地用途管制等保护政策并未有效地发挥作用。为真正地控制耕地的流失速度和数量，政府应该建立耕地保护的补偿机制，设置有针对性的公众参与机制，创设耕地外部效益财产权，以确保耕地保护的真正实现。

随着我国人口增长和经济发展，农产品消费需求将呈刚性增长，水资源短缺问题日益严峻，成为我国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巨大挑战。为解决农业用水问题，要发展生物性节水技术，开发旱作节水技术，发展现代节水灌溉技术，解决水质性缺水问题，提高节水装备水平，加强管理制度和机制创新，全面提高农业用水生产力（薛亮，2012）。另外，由于我国大部分地区水资源短缺，我国乡村水利建设也面临重重困境，如灌溉系统老化失修、灌溉面积萎缩、灌溉效益低下和农业生产力下降等。目前，成立以农民为主体的用水户协会逐渐上升为全面性的政府行为，纳入了国家改善农业基础设施的整体战略之中。蔡晶晶（2012）从乡村水利合作建构的三种制度途径（科层建构、交易建构和社会建构）出发，以福建省清流县灵地镇吉龙村农民用水户协会为个案，分析乡村水利合作出现困境的深层障碍及其根源，探讨用水户协会面临的科层化、缺乏激励与组织失效等问题的解决思路。



三、食物经济与管理

改革开放 30 多年来，中国的粮食供给能力大幅提高，推动了人民生活水平从温饱向小康过渡，然而，如果用历史理性来审视当前的粮食供需紧张平衡就会发现，中国并未摆脱粮食安全的威胁，只是短期内通过石油农业将粮食安全问题转化为生态安全问题和食品安全问题。学界关于我国食物消费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粮食安全、食品安全、食物消费等领域。

保障粮食安全始终是我国农业发展的主旋律之一，新时期的粮食安全被赋予了更为丰富的内涵和定义。倪国华等（2012）指出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属于粮食供应短缺与生态环境压力增大时期。改革开放以来，化肥、农药、动植物激素等生产要素的大量引入，促使粮食供需达到紧张平衡，短期内粮食安全问题得到缓解，长期来看，农业面源污染加剧，土壤毒化、地下水超采、土地荒漠化与水土流失继续恶化，粮食供给不可持续。于晓华等（2012）对中国所面临的粮食安全问题的背景和政策做了一个全面的总结和分析，并指出中国的粮食自给率按照能量计算已经下降到了 70%。为了更好地制定粮食安全政策，中国政府必须区分食物安全（Food Security）、口粮安全（Grain Security）以及饲料安全（Feed Security）三个概念，中国现在和将来的粮食安全实际表现为饲料安全。黄季焜等（2012）从个体、区域和国家三个不同尺度上考量，认为过去 30 年我国食物安全水平都得到了不断提高，广义的粮食安全基本上得到保障。虽然狭义的粮食安全已经突破了 95% 自给率的国家既定目标，但是大豆供给安全已从国内生产转向依靠国际市场进口，玉米供给安全正逐渐从国内生产向国际市场进口转变。吕新业等（2012）在对粮食消费因素、生产因素、进口因素进行趋势性分析的基础上，对稻谷、小麦、玉米、大豆等主要粮食品种进行供需预测认为，2020 年我国粮食消费、生产与进口量分别为 6.93 亿吨、6.44 亿吨与 0.49 亿吨。

食品安全是近年来国内学界的热点议题，确保食品安全是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和人民生活不断改善的必然要求。王可山（2012）指出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食品安全的内容和面临的主要问题也不同。在食品短缺时期，更加关注食品的数量安全，发展生产、保障供给是主旋律，强调生产或提供的食品要在数量上保证食品消费的需求。当数量安全问题得到基本解决之后，食品是否卫生安全、营养结构是否合理受到关注，重视生产或提供的食品在品种质量、营养卫生上保证食品消费的需求。曲峻岭（2012）认为食品安全问题的根本原因是，我国经济进入转型阶段，有关农产品和食品的法律法规体系和技术标准体系尚不健全，执法监管工作滞后。基于对欧美等发达国家食品安全监管工作的主要特点的分析，总结发达国家食品安全监管工作的经验和做法，提出食品安全工作应由统一部门管理并形成独立执行机构，食品标准应与国际标准接轨，提高检验技术能力，建立企业自我监控体系，加强法律法规建设。王志刚等（2012）根据 12 个食品加工行业中已获得 HACCP 认证的 334 家企业的调查数据，实证分析了食品安全规制对生产成本的影响。结果表明，

食品安全质量对生产成本具有内生性，提高资本使用效率、改善要素投入结构、扩大企业生产规模是厂商降低质量安全成本效应的有效途径。陶善信等（2012）提出信息不对称已被认为是食品安全问题发生的本质原因，然而，问题不可能通过信息对称来解决。信息不对称也不是造成市场失灵的充分条件。要解决食品安全市场的信息不对称问题，必须控制食品的属性特征、食品市场的结构特征以及安全食品的流通过程，满足信任机制生成和稳定的条件，从而使食品安全市场建立起有效的信任机制。

食品安全领域的微观研究主要集中于食品生产加工企业的生产经营行为和消费者层面对安全的支付意愿与支付行为等方面。胡颖廉（2012）基于外部信号理论分析了食品生产经营者行为的影响因素，以食品生产加工环节为例，构建了我国食品生产经营者违法行为影响因素的分析框架。实证研究发现，产品质量监督抽查合格率以及食品工业产值与农产品产量之比越低，食物中毒发生率越高，生产经营者违法情况越严重。李红等（2012）认为奶制品生产环节的控制和管理是奶制品质量安全管理的关键点，利用内蒙古的调查数据分析了影响奶牛养殖户质量安全行为的因素，发现要想规范和优化奶牛养殖户的饲养行为、消毒行为、挤奶行为，必须提高奶牛养殖户的受教育程度，进行规模化、专业化养殖，加强技术指导和食品安全知识教育，引导奶牛养殖户参加奶业合作社。吴林海等（2012）在对可追溯猪肉不同质量安全信息做出设定的基础上，研究了山东省潍坊市765位消费者对含有不同质量安全信息的可追溯猪肉的偏好。结果显示，消费者对食品质量安全的关注度、对可追溯食品的认知、关注“猪肉可追溯标签”信息、自身收入与家中是否有孕妇、受双汇“瘦肉精事件”影响等变量显著影响其对含有不同质量安全信息可追溯猪肉的偏好。文晓巍等（2012）以可追溯肉鸡为例，调查了广州市消费者对可追溯食品的感知利得、感知风险、信任态度、购买意愿以及对可追溯体系的监督意愿，探讨消费者感知利得、感知风险、信任态度与购买意愿、监督意愿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消费者从可追溯食品中的感知利得越大，越倾向购买可追溯食品和监督可追溯体系；消费者感知风险越大，购买意愿越低；消费者对可追溯食品信任态度越强，购买意愿越高；而消费者购买意愿越高，其对可追溯体系的监督意愿也越高。

食物消费和需求弹性受人口结构、收入水平、城镇化程度等因素影响。钟甫宁等（2012）认为城镇化从两方面影响粮食的需求：一方面，城镇化提高居民食品消费结构中动物产品的比重，增加粮食需求总量；另一方面，城镇化降低劳动强度并减少热量需求从而降低粮食需求总量。无论是城市还是农村，食品消费结构中动物产品的增长是我国粮食需求增长的主要原因，农村居民最终粮食消费总量低于城市居民。吴蓓蓓等（2012）基于2007~2009年广东省城镇居民家庭7类食品的消费数据，对不同收入家庭食品消费结构及其消费行为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城镇居民家庭乳品、油脂类和肉类等动物性食品的支出弹性大于1，与中等和高收入家庭相比，低收入家庭这三类食品的消费支出弹性也相对敏感；在不同收入分层中，低收入家庭油脂类食品的消费价格弹性相对敏感；当收入和价格同比例变化时，城镇居民家庭更愿意增加对肉类、蛋类和乳品的消费。郑志浩等（2012）利用2004年江苏省城镇住户调查数据，分析了收入分布状况的变化后中国城镇



居民家庭在外食物消费的变化，认为增加居民收入，特别是增加中低收入阶层居民的收入，将会明显增加全社会在外食物消费的支出和各类食物的消费量，收入分布状况的变化会影响中国城镇居民家庭在外食物消费。唐学玉等（2012）以南京市场消费者为样本，分析了安全农产品消费动机的构成维度，并以消费动机为细分变量，对安全农产品市场进行细分。研究表明，安全农产品市场可以分为健康寻求者、时尚环保者与安全寻求者三个细分市场，其中安全寻求者是最大的消费群体。

四、营养与健康经济

国民营养与健康状况是反映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与社会发展、卫生保健水平和人口素质的重要指标。良好的营养和健康状况既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基础，也是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目标。关于营养与健康经济的研究主要包括城镇化对农民的健康影响、农民健康意识与农作物用药选择、卫生服务可及性与农村居民健康关联性、中国西南贫困地区的营养与人力资本状况、发达地区的家庭食品消费研究、健康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等。

秦立建（2012）等认为城镇化征地降低了农民的健康状况，被征地农民的健康状况明显低于有地农民的健康状况，其主要原因在于征收农用土地时补偿标准较低，农民实际得到的补偿款较少，无力进行必要的健康投资，降低了被征地农民的健康水平。人的健康程度和营养息息相关，而所获取的营养又与食品的健康程度呈现一定的相关性。喻永红和韩洪云（2012）基于对湖北稻农 IPM 采用的调查数据，利用决策模型进行分析，结果发现：农民对传统化学防治的健康危害认知是影响 IPM 的重要因素之一；稻农的年龄、性别、受教育程度、是否兼职、种植规模、离城镇的距离等也是重要的影响因素。王永强和朱玉春（2012）通过对农户的深入访谈和实验，利用问卷调查，使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证实零售商对农民的不安全用药的影响最大，同时农民的不安全认知、风险厌恶程度对不安全用药也有一定的影响。

老龄健康问题也是社会发展进程中面临的重大议题，随着经济学的发展，老龄健康问题不再仅局限于医学方面的研究，而成为一门交叉学科，经济、环境等与老龄健康的研究逐渐成为近年来这一研究领域的主要内容。王俊和龚强等（2012）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对老龄健康与经济学的相关性进行研究。研究表明，人口老龄化远远超前于经济发展，对处于发展中的中国而言未富先老的人口压力使得我国养老任务十分艰巨，不利于我国的经济的发展。卫生服务的可及性与农村居民的健康是不平衡的。辛怡（2012）根据 1997 年和 2006 年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数据，利用随机截距逻辑回归模型分析当前卫生服务可及性与农村居民的健康关系问题。研究表明：需求方变量中收入和医疗保险对健康影响显著，供给方只有价格是显著的，需求方影响程度大于供给方；家庭对健康的影响在削弱；供给方在一定程度上是有所改进的，但还可以继续改进，同时需求方存在个人障碍，降低了卫生服务利用。

我国贫困地区居民普遍营养摄入不足，健康状况有待提升。王兴稳等（2012）在贵



州省普定县随机抽取了3个行政村8个自然村的全户数据，利用多元线性回归方程分析西南贫困山区道路是否会影响其农户的食物获得能力。研究表明，调查地区的农民温饱问题已经基本得到了保障，但农民的营养结构还是不太合理，蛋白质摄入普遍不足；距离集贸市场越远、道路状况越差，农民的膳食搭配越不合理；农民的收入以及居住地到城镇的距离对膳食的多样性有显著的影响。目前我国贫困地区中小学寄宿生的营养不良问题十分严重，亟待及时制定相应的政策进行相应的营养干预。齐良书和赵俊超（2012）通过对照试验，利用双重差分法，评估了通过校园餐进行的营养干预对贫困地区寄宿人力资本发展的影响，发现营养干预对学生的身高、体重、肺活量等都有一定的正面影响，同时对于不同性别、不同年龄段、不同的家庭背景都有着不同的影响效果。在计量分析的基础上，结合相关文献，提出了相应的改善措施：一是尽快把为贫困中小学寄宿生提供校园餐纳入国家义务教育发展规划；二是制定明确的推动贫困地区寄宿制学校校园餐项目发展的时间表；三是注重培养地方政府部门和农村寄宿制学校提供校园餐的能力；四是以校园餐项目带动贫困地区农副业发展，促进农户增收。

发达城市的营养问题也是研究课题的重要组成部分。吴蓓蓓等（2012）在2007~2009年广东省城镇居民家庭七类食品的消费数据基础上，运用QUAAIDS模型对不同收入家庭的消费结构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稳定食品价格、提高最低生活保障标准和最低工资标准等措施，是确保城镇居民家庭的消费需求、营养摄入水平及生活质量的前提。唐学玉和李世平（2012）以南京市场消费者为样本，运用因子分析方法发现：安全农产品市场可以分为健康寻求者、时尚环保者和安全寻求者，其中安全寻求者是最大的消费群体。营养与健康息息相关，而健康又与经济有着密切的联系。王弟海（2012）利用拓展的Romsey模型，通过考虑食物消费和营养对健康人力资本的作用，研究了健康对长期经济增长的影响。最后发现，来源于食物消费和营养的福格尔型健康人力资本不能产生内生经济增长机制，但如果有外生技术进步，这种福格尔型的健康人力资本是可以扩大经济增长率的；富国具有高资本、高健康和高消费水平，而穷国则刚好相反。

五、农产品市场与贸易

流通渠道的建设是农产品贸易得以顺利开展的必要前提，而相对落后的农产品流通渠道建设一直是制约我国农产品市场快速发展的瓶颈。赵晓飞和李崇光（2012）通过构建农产品流通渠道变革驱动力模型，分析了农产品流通渠道变革的影响因素及其作用机制，并提出我国农产品流通渠道变革应朝着渠道战略“双重化”，渠道结构“扁平化、多元化”，渠道关系“联盟化、一体化”，渠道职能“专业化”，渠道主体“组织化、规模化”，渠道运作“信息化”，渠道终端“连锁化、超市化”，交易方式“现代化”，渠道环境“规范化、有序化”的方向发展。

对于当前农产品流通所存在的问题与应对策略，学术界提供了多种思路。王冲和陈旭（2012）将农产品价格上涨与流通改革相联系，认为农产品价格大幅度上涨是造成当前通



货膨胀的主要原因，农产品的流通效率亟待提高。李连英和李崇光（2012）研究发现我国的农产品流通现代化存在着农产品流通组织化程度低、农产品流通主体整体水平不高、农产品流通领域基础设施不健全、农产品流通交易方式落后、农产品流通信息化水平较低及农产品流通技术落后等问题，必须采取加快农产品流通组织化程度、提高农产品流通主体整体水平、加强农产品流通基础设施建设、不断创新农产品流通方式、加快推进农产品流通信息化建设以及提高农产品流通技术水平等具体对策。殷延海（2012）则提出了农超对接模式是我国农产品流通渠道今后发展的理想模式。

随着我国在国际上贸易大国地位的确立，农产品贸易的发展对我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作用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影响我国农产品贸易的因素有很多，学术界在此方面进行了广泛的研究。贾伟和屈四喜（2012）对中国与东盟农产品贸易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中国各省份地区生产总值、关税税率变化、农产品竞争力水平显著影响中国与东盟农产品贸易，中国与东盟农产品贸易的增长不能忽略世界经济增长的影响。宫同瑶、辛贤和潘文卿（2012）通过构建一般均衡模型检验了贸易壁垒对中国—东盟农产品贸易的影响程度，结果表明，农产品生产和需求的变动增加了贸易壁垒对双边农产品贸易的影响，而贸易成本的下降显著降低了贸易壁垒对双边农产品贸易的负面影响。司伟、黄春全和王济民（2012）利用恒定市场份额模型从进口需求效应、出口结构效应和竞争力效应三个方面分析了中日、中韩双边农产品贸易增长的主导因素及其对双边农产品贸易增长的贡献，结果发现，进口需求效应一直是中、日、韩农产品贸易增长的主导力量，而出口效应是制约其增长的原因。刘艺卓（2012）运用 GTAP 模型，就欧韩自由贸易协定实施对中国贸易规模、GDP、福利水平、农产品贸易结构以及国内农业产出结构等方面的影响进行了一般均衡模拟研究。结果表明，欧韩大部分产品实现零关税后，中国将会受到贸易转移效应的影响而出口减少、福利下降，中国的果蔬和畜产品受冲击较大，生产规模将有所萎缩。

近些年，中国农产品的贸易逆差不断增加。汤碧（2012）研究发现，巴西、印度、俄罗斯和南非是近年来中国农产品贸易逆差的主要来源，中国与巴西、印度、俄罗斯和南非农产品贸易的竞争性并不十分突出且趋于缓和，中国与其他“金砖国家”的农产品贸易存在互补性，并具有较大贸易潜力。何敏和田维明（2012）通过测算出口复杂度指标，表明中国农产品出口以中等技术产品出口为主，并逐步向中高技术产品出口转变。如今我国农业发展的内外环境已经发生深刻变化，粮食生产丰歉交替、结构性短缺、农产品价格温和上涨与市场频繁波动、持续性贸易逆差等长期性、常态化趋势已经开始显现，对农业生产方式、经营体制、市场调控、贸易格局、政策支持等多个方面都将产生深远影响。在农业政策方面尤其需要做出适应性调整，应更加注重政策的稳定性、协调性、针对性和实效性，发挥其在解决农业发展的长远性、基础性等方面的保障作用（沈贵银，2012）。

针对我国农产品贸易中存在的问题，众多学者提出建议改善现状。王阿娜（2012）根据汇率波动与农产品价格波动关系，提出农业结构优化和农产品贸易、农产品价格等方面的对策。朱晶和吴国松（2012）对中国农产品非关税贸易措施的进口限制效果进行了整体和分类的全面考察，他们指出在未来的多边贸易谈判过程中，应该结合中国农产品现



有贸易结构特征与贸易政策效果，借鉴相关国际经验保护中国农业的合法权益，要综合考虑关税减让幅度、特殊产品比例、敏感性产品比例等方面的利益得失，有效采取反倾销、反补贴的法律措施抵制进口农产品的冲击，争取总体利益的最大化。杨蕾、陈永福和安玉发（2012）以中国发起的首例农业关联产品——马铃薯淀粉反倾销案件为研究对象，构建了双对数非平衡面板数据模型，对实施的马铃薯淀粉反倾销措施的贸易效果进行了实证分析，并提出对于涉农产业来说，需要建立健全贸易救济体系，采取多种方法和手段减少涉农行业的损害，维护涉农行业的利益，保持国际贸易公平的竞争环境。

六、农村与区域发展

减少贫困是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社会经济发展所力图实现的重要目标，尽管不是所有的国家都能有效地实现。在改革开放以来经济高速发展的30年间，中国农村贫困人口数量大幅度下降，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效。学界关于农村区域与管理领域的研究重点集中在分析贫困机制和成因、扶贫的有效方式及效果评价、农村集体经济模式等方面。

我国贫困地区农户主要从事农业相关工作，贫困农户收入对种植业的依赖性很强，种植业收入低下依旧是其贫困的重要原因之一。马铃等（2012）研究了贫困农户种植业收入低下的原因。贫困农户种植业收入低下的主要原因是投入不足而不是效率低下。在主要投入要素中，贫困农户的中间物质投入量低于一般农户，但是效率高于一般农户；在劳动力投入方面，无论投入量和效率，贫困农户都高于一般农户；在生产性固定资产方面，无论投入量及效率，贫困农户均低于一般农户。罗楚亮（2012）讨论了各年份中分项收入对于贫困发生率的影响。农业纯收入对贫困指标的贡献份额都是最高的，但相对贡献份额具有明显的下降趋势；而外出务工收入和其他工资收入，在贫困决定中的作用都在逐渐增强；财产收入和转移收入在贫困决定中所起的作用一直都非常低。贫困减缓中收入分配弹性的增加意味着收入分配的不均等性对于贫困减缓所造成的不利影响在加剧。刘红秀（2012）基于西南民族贫困地区调研数据，分析当地农户关于防灾减灾认识及行为的影响因素，认为上述地区农户的防灾减灾认知普遍薄弱，未采取有效防灾或良好减灾行为；农户的防灾减灾意识、农户对自然灾害危害的感知、农户经济实力以及政府的防灾减灾措施对农户防灾减灾行为的影响较大，同时表明农户防灾减灾知识及技能有待提升。

自然地理环境对农户贫困的约束是显著的。曲玮等（2012）以甘肃省51个扶贫开发重点县为例，基于资源约束和地理环境对社会经济发展产生影响的理论框架，实证研究了自然地理环境的贫困效应。结果表明，经济社会发展在很大程度上能缓解由不利的自然地理环境对贫困造成的负面影响，但是气候环境、耕地质量和面积、地理区位和交通条件等因素，仍然是导致贫困的重要因素之一。郭建宇（2012）从不同角度构建了多维贫困测量体系，并以陕西省贫困县为例，通过调整多维贫困测量指标、指标取值和权重，考察其对多维贫困估计结果的影响。结合区域多维贫困的实际选择合适的指标、剥夺临界值和指标权重所建立的多维贫困指数，多维贫困测算方法超越了以收入或支出为标准的传统贫困



测量方法，是更加符合实际的贫困测量新方法。

生计风险是农户濒临贫困境遇的直接影响因素。许汉石等（2012）对农户在生计过程中的风险状况、生计资本对生计风险的影响作用等问题进行实证研究认为，当前我国农户主要面临大病风险、子女受教育风险和养老风险；农户所拥有的生计资本对其生计风险具有极其复杂的影响关系，生计风险的大小还与农户在利用生计资本基础上所选择的资本搭配及生计策略有着密切关系。刘生龙等（2012）探讨了中国农村老年贫困问题，检验了健康因素对农村老年贫困的影响。随着健康状况的改善，居民的劳动参与显著增加，贫困发生率显著下降。相对城镇居民和青壮年农村居民而言，健康对农村老年居民贫困的影响更加显著。健康状况的改善能够提高农村年居民的福利比率。林闽钢等（2012）认为贫困的代际传递是长期贫困的关键问题，基于 CHNS 数据测算后发现，贫困家庭的代际收入弹性大，收入流动性较差；贫困家庭的子女收入对父母收入的依赖性更强；贫困家庭父辈和子辈在婚姻状况、受教育年限、收入水平、就业机会和医疗保险情况等重要社会因素方面具有明显的相关性，贫困家庭子女容易受到上一代经济和社会劣势的影响；贫困家庭父辈和子辈在受教育水平、上学机会、就业状况以及医疗保险等方面都处于明显劣势，表明农村贫困家庭贫困代际传递明显。

减少贫困人口、提高扶贫效率是扶贫工作的主要任务。许翔宇（2012）认为我国贫困地区主要以农业为主要产业，因此农产品供应链管理的实践有望为解决这一问题提供新的视角和方向。需要完善供应链主体的利益分配机制，推进信息化建设和提高信息共享程度，培育和发展农产品供应链组织体系，建立农产品供应链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章元等（2012）论证了中国通过优先发展城市工业部门来推动工业化并推动经济增长和降低农村贫困有其必然性，在多地少的条件下优先发展附加值较低的农业未必是一个好策略。此外，还提出通过城市倾向政策推动工业化，创造出新的经济增长点，并创造大量非农就业岗位吸收农村剩余劳动力，而贫困农户能够进入劳动力密集型的工业部门就业并获得更高收入。郭晓鸣等（2012）对成都温江区所代表的城郊农村探索新型城市化进行了案例分析，以土地管理和利用制度调整为基点，在不变动农地产权关系的基础上充分发挥农民的主体作用，实现以“持地”城市化、“就地”城市化、“主动”城市化和“田园”城市化为特征的新型城市化模式创新。

农村社区集体经济的发展是提升区域经济水平和农户收入水平的重要因素。郑有贵（2012）定义了农村社区集体经济组织，它是按照 20 世纪 50 年代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要求在全国普遍建立起来的，经历改革，实行土地等生产资料的农民集体所有，以家庭承包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为基本经营制度，经营管理集体资产、资源、资金和服务成员，以保障农民基本经济权益，促进农业农村经济发展、农民增收、社区和谐进步的经济组织。王娟等（2012）构建了一个具有一般性的公共支出与减贫关系的理论框架，并基于省级面板数据分析各项公共支出的减贫效应。检验结果发现，社会救济支出、基本建设支出和农业性公共支出对减贫存在显著效应，但科教文卫支出作用并不显著。各项公共支出的减贫效应排序为：农业性公共支出 > 社会救济支出 > 基本建设支出。尹文静等



(2012) 从农户生产投资视角分析了农村公共投资对农户生产投资影响的区域差异。因为不同地区市场因素、农户特征等因素的不同而对农民生产投资表现出不同的影响程度，而且这种影响关系随着时间变化产生波动。这一关系的跳跃性变化往往与国家重要政策的出台和经济水平的迅速发展密切相关。

七、农村金融与保险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飞速发展，但是随着城乡发展不均衡问题日益凸显，“三农”问题成为各级政府努力解决的重点内容。近些年，政府组织将建设农村金融体系放在重要位置，农村金融这一概念虽然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但却是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才逐渐流行起来。

“十二五”规划明确指出，要进一步做好农业农村经济发展工作，农村金融作为农村经济发展的核心，是优化农村资源配置和破解农村资金约束的重要力量（黎翠梅和曹建珍，2012）。关于农村金融与农村经济发展关系的研究中，丁志国、徐德财和赵晶（2012）通过实证分析表明农村金融规模的扩大有助于农村经济发展，农村经济发展反过来又可以促进农村金融体系的完善建设，两者相互促进。孙永强（2012）认为在城乡二元结构下存在的金融经济，整体发展水平的提高将会扩大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其影响具有滞后性。王文成和周津宇（2012）通过 QR 模型和 IVQR 模型，在考虑异质性和内生性的前提下，分析了不同收入水平的农户运用接待资金实现增收的效果，结果表明，接待资金对高低收入水平农户均不显著，而对中等收入水平农户收入效应明显。易小兰（2012）通过实证分析表明，家庭生产经营总支出对于农户正规借贷有正向影响，而家庭总收入则具有负影响；不同地区的农户，其借贷需求也不同。易小兰提出可发展多元化的农户贷款担保体系，促进农村金融的发展。张兵和张宁（2012）认为，非正规接待显著降低了农户受到信贷约束的概率，进而提高了农户的信贷可获性，我国应当尽快出台相关的法律法规，加快农村非正规金融合法化的进程。

过去农村金融为了服从国家经济发展的总体战略，成为了向工业和城市输送农村经济资源与剩余的渠道。从这个意义上讲，我国农村金融的发展不可能沿着自身内在的逻辑展开和扩展，而是由政府主导的强制性制度变迁过程。然而，这种由政府主导的农村金融体系不仅不能促进农村经济的增长，反而极有可能会抑制农村经济的发展。胡士华、武晨笛和许静林（2012）认为农村金融制度的改进，应由政府外生主导型向民间内生型转变，进而积极引导纯粹的民营资本进入农村金融领域，充分发挥各类新型农民专业合作社在农村融资活动中的作用。师荣蓉和徐璋勇（2012）同样认为，通过减少政府的不良干预、优化资产质量、深化产权制度改革、提高农村经济发展水平可以有效促进农村信用社成本效率的提成。陈东平和周振（2012）认为政府的强力管制在一定程度上有益于新型农村合作金融机构支农绩效的提成，但应警惕其对新型农村合作金融机构的过度干涉所产生的消极影响。